

谈谈社会学研究^{*}

胡 绳

今天中国社会学学会举行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费孝通同志让我来参加，我愿意就此机会讲几句话。

中国社会学学会从1979年3月成立后，七年间，为重建社会学，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研究机构，在几个大学里建立了社会学系；招收了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起一支队伍；也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各方面对社会学逐渐重视起来。社会学工作者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

在这期间，费孝通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而且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方针、方法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费老不是个说空话、只提号召的人，而是个身体力行、自己努力去做的人。他以身作则，实实在在地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做了许多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很有成果。

费老对社会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意见，我以为是有道理的。比如费老在1982年写了《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其中提到，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他说：“中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中国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但必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费老还提出，要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就要从实际的调查研究做起。他说：“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此，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费老的这些意见，是带有根本方针性的意见。我个人很赞成这些意见。

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很注重研究社会，只是大致从三十年代起不再把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毛泽东同志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他自己亲自做农村调查。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陈翰笙同志也曾倡导搞农村调查。薛暮桥同志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包括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而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这些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前进；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出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而

^{*} 这是胡绳同志1986年4月26日在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刊发表时略作删节。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小城市有许多娼妓，农村里处处有土匪，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的；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也是这个性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在不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并探索革命的道路，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和民主运动中，不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

全国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在1956年以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了。主要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也需要有个转变。但在长时期内，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需要社会科学这个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学科没有受到重视。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过1952年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后，实际上就都被取消了。1954年我参加筹备出版几种学术刊物，当时只出版了《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三种杂志，别的就没有再去管。这一情况的发生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还有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观念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就社会学来说，这里我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至少有些同志是这样想的。这显然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而它本身不能代替各个具体学科。正如自然辩证法可以指导物理学研究，但不能说自然辩证法就是物理学，有了自然辩证法就可以不要物理学。

第二，在革命时代，提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才能使社会进步发展，这是不错的。但是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社会就自发地前进了。通过这三十多年的经验，大家对此都有了深切的体会。

当然，有些在旧社会棘手的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经过革命是解决了。例如土匪为患问题，现在再没有抢掠岗的绿林好汉下山抢火车了。再如，娼妓现在虽然又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但总的说解放后娼妓问题是解决了。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都知道，旧社会娼妓多得不得了。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中就讲，在寻乌那么个二千六百多人的“城市”（实际上只是小镇），妓院就有三十多家，依靠这种行业为生的人有一百六十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这样严重的现象通过民主革命是消除了。但是，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自然能进行良性的运转，因而没有什么社会问题了。实际上，有些旧社会留下的问题还存在或又有发生，也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我看过一位社会学家解放前写的关于中国贫穷问题的著作，他列举许多材料说明中国是

多么贫穷。他提出，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创办工业，等等。但他不能说明，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发展不了，工业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但是，如果说三座大山推翻了，贫穷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富起来很不容易，需要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做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可能得到良性的运转，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然也就解决不了娼妓问题、犯罪问题等等社会问题。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良性地运转，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要实现良性的运转，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需要作许多努力，因此也就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第三，如何对待旧的社会学，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学所调查收集的许多资料是有用的，其研究方法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帮会制度的著作，大概要算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名叫《洪帮》的书。那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发现在中国居民中有帮会组织，很有势力。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判定这种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统治起妨碍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殖民统治者所利用。因为有这样的实际目的，他们的研究者就不会任意编造一些材料，这样对他们毫无用处。但由于受研究目的限制，他们可能只注意某些材料，忽略了某些其实是很重要的材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利用这些材料，当还然要进行鉴定和补充。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和吸取某些方法，而且它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供我们参考。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在革命时期，我们没有吸取这些经验的必要，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如果搞得不好，甚至会恶性运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目的确有某些等同点。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原则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在一方面保持良性运转的。但是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地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中寻找经验吗？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经验，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使用的一些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是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所利用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由此可见，把旧的社会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笔抹煞，是不对的。费老说过这样的话：“批判过了头，成了整个否定，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全盘否定前人所做的事，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的态度。”我同意这个意见。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可以利用旧社会学留下的某些材料和方法，并且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研究的某些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

人类文化从来不是凭空创造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许多东西，都是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成果。例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不是凭空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固然是一种创造，但其形式还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有继承关系。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社会制度是这样，学术思想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资产阶级社会学，于是我们对社会的研究就不能叫“社会学”，避免用同样的名称，这是不对的。例如经济学，资产阶级叫经济学，我们这方面的理论就不能叫经济学？当然这不仅是名称问题，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确有继承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就是借鉴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费老说，我们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适合于今天中国国情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这是新的社会学，但并不是与过去毫无关系，凭空建立起来的。费老说了两方面的继承，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实践留下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这是宝贵财产，要吸收到社会学里来；同时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社会学的成果，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我以为费老的这些意见是对的，对社会学发展是有益的。

我国的社会学总的看是能够大发展的，既有发展的需要，又有发展的可能。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在学科建设上可能是必要的。究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说不清楚。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一些学科研究。尽管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可是实际上，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可以说，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比如生活方式问题，我们过去不大讨论，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这算是什么问题呢？算经济问题？它当然与经济有关系，但它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比如婚姻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与经济当然有关系，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也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人口问题研究现在变成一个专门学问了，这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费老研究很有成就的小城镇问题也是如此。小城镇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综合性问题。总之，社会学的用武之地是很宽广的。

前边说过，我很赞成把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要有理论，但是理论从哪里来，还是要从实际中来的。理论不是从书本上的原理中引申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某些书本上引申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来的。最近费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社会学研究不过是可以开展这类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例子。我们国家正处在空前大变革的过程中，象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一样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到处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不懈努力，就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社会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发展这种社会学。我认为只有发展这种社会学，才能在世界学术讲台上取得我国的地位”。我看这个意见也是对的。我们的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遇到了历史上很难遇到的社会变革时期。例如费老的故乡江苏吴江县，七十年代只有很小的几家企业，到三中全会前仍没有多少变化，可就在近几年中，有了大发展。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几年的变革，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中所发生的变化。一

个社会学家要亲身经历调查一个城镇一百年间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的社会学家，到一个地区看上五年、十年就看到了这样的变化。现在还有些落后地区，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还很薄弱，对外界还很闭塞。但是新筑的铁路一旦修到那里，随之将引起经济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变化。我们如果把这些地区作为研究基地，去调查这些地区原来怎样，几年、十几年功夫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这里可以得出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这样的学术成果可能是很有价值的成果。我们正处在国家全面改革中，社会正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丰富、生动、具体的内容，只有对此有所了解认识，才能总结出新经验，解决好新问题。因而我非常赞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基础工作。当然也要讲求调查方法，怎样调查好，费老经验很多，大家也有很多经验。这方面也要提倡百花齐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还很难说成绩有多么大。我希望社会学所的同志同全国各方面的社会学家多联系，通过中国社会学会加强同全国社会学者的联系，也要加强同各个地区、各大专院校社会学所的联系。社会学所办了个杂志，叫《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院出的杂志要办好，我看要依靠全国，力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一学科中最好的成果拿出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综合性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刊登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志们写的文章，但大多数文章还是来自各方面、各地区、各院校的。我想《社会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刊物一样，应变成全国社会学工作者的共同园地。《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有责任同各方面多联系，努力使社会学方面好的论文、好的调查报告，能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